

中華學術叢書

興與象

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

【美】夏含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學術叢書

〔美〕夏含夷 著

興與象

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美)夏含夷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中華學術叢書)

ISBN 978-7-5325-6298-5

I. ①興… II. ①夏… III. ①文化史—中國—古代—文集 IV. ①K220.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027455 號

責任編輯：童力軍

中華學術叢書

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

[美]夏含夷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1.125 插頁 7 字數 269,000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

ISBN 978-7-5325-6298-5

K·1540 定價：4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中華學術叢書

興與象

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

出版說明

自 1991 年王永興先生的《唐勾檢制研究》、柳存仁先生的《和風堂文集》與項楚先生的《敦煌文學叢考》出版以來，《中華學術叢書》至今已走過了十五個年頭，已刊與將出的名家研究著作，也已接近二十種，并在海內外學界贏得了高度的贊譽。當前民族文化的復興已成為國家的文化戰略，而學術昌隆，正本清源，更是文化復興的前提，為此，本社決心花大力氣，通過相應的調整，來加強本叢書的出版力度。

《中華學術叢書》定位為海內外漢學界高端論著交流的平臺，以及時薈萃一流漢學研究著作為己任。她與集成性整理性質的《中華要籍集釋叢書》並列，將成為本社古籍整理與古籍研究的兩個核心品牌。

《中華學術叢書》將不限於原初以傳統漢學研究為主的格局；凡學殖豐厚、思理深刻、卓有創見的漢學研究，無論其方法是傳統的還是新潮的，其視角是單一學科的還是跨學科的，都將進入編者的視野。

《中華學術叢書》的作者，將由原來以大陸老一輩專家為主，而擴展為朝向一切術業有專攻的學者，她既為名家大師一生著作的集萃，也可以成為中青年俊彥頭角初露的溫床；她對於大陸、港澳臺乃至各國漢學家的優秀著作一視同仁，因此部分漢譯著作，也將

適當採納。

《中華學術叢書》的形式，以專著、專史、專題論集為主，也適當地採用“文存”的形態，如果有既合乎基本學術規範，而形式更有創新的著作，也不妨嘗試。

我們感謝已進入本叢書的各位專家的奉獻，感謝本叢書各個方面的熱誠讀者；我們更衷心地期盼與更廣大的作者群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好《中華學術叢書》這一知名品牌——爲了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自序

在很多方面，這部論文集可以說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的拙著《古史異觀》的續集。像《古史異觀》一樣，這部文集也收錄了二十餘篇文章，涉及的年代遠至商、周，下逮秦、漢；討論的內容亦包括出土文獻的甲骨、金文和簡帛寫本與傳世經典的《周易》、《詩經》和《竹書紀年》等等。其實，我的學術興趣多年來始終沒有改變：利用出土文獻來解決傳世文獻上的某一老問題，或者利用傳世文獻來解讀出土文獻所提出的新問題。總之，無論是本集中的《興與象——簡論占卜和詩歌的關係及其對〈詩經〉和〈周易〉的形成之影響》、《試論鄉字在何組卜辭裏一種特殊用法》、《簡論“閱讀習慣”——以上博〈周易·萃卦〉為例》到《三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和《四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等文章，無一不是得益於這種研究方法的。

與《古史異觀》最明顯的不同點是，那部文集收集的是我從事漢學研究前二十多年的學術成果，而本集只是收錄了最近五六年成稿的論文。這當然不表明近年來自己的學術研究速度倍增，反之，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因家務繁重及學校的行政職責），我現在完全沒有過去那樣純粹做研究的工夫，更遑論近來身體、精神遠非昔日可比。那何以這幾年用中文撰寫的學術論文數量反而增加了，我想可以歸結於以下兩個因素：一個是較為實在的，另一個可

以說是“有意爲之”。

先來談談實在的原因。在《古史異觀·自序》裏，我已經介紹了自己從事漢學研究的經歷，我自 1978 年進入大學的研究所，1980 年第一次和中國學者一起參加學術研討會（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也是在 1980 年開始用中文撰寫學術論文。次年雖然有機會去中國參加一次研討會（即 1981 年在山西省太原召開的第四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但當時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剛剛開始，外國學者想得到國內的邀請函，頗爲不易。我們每次去中國參加會議都會遇到某種困難。國內召開會議的主辦單位所要面對的問題及困難更可想而知。我還記得時任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秘書組召集人趙誠先生告訴我，爲了能讓我們一批外國學者參加太原的古文字研究會，他四處奔走，和幾個不同級別的外辦開了多次會才獲得批准。不僅如此，當時“文革”之後的中國出版界一片凋零，百廢待興，學術刊物寥寥無幾，而且刊物的主編者對海外學者都不甚了了，不太願意把寶貴的篇幅提供給他們（當然也毋庸諱言，有些人也害怕國家政策一旦有變，自己則又將首當其衝成爲批鬥的對象）。此外，我那時是個剛剛踏入學界的年輕學者，囊中羞澀，不是每年都能買得起機票訪問中國的。因而，當時自己用中文寫的文章也就不太多。

現在，中國國內學術研究狀況大有改觀。所到之處“國際化”的勸誡之聲不絕於耳，連中國古代文化史界也無法置身於這股大潮流之外。教育單位常常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倘要得到教育部的經濟支持，則一定要有外國代表參加活動。以我本人爲例，幾乎每個月都受到至少一個邀請，即使很願意參加，但實在沒有辦法都接受。我之所以仍盡可能地參加這些學術活動，並非對上海、北京的中國佳餚情有獨鍾，而是因爲這十幾年來中國古代文化史界變得非常活躍，全國各地幾乎每天都有新的考古發現，而且每年都有一

批年輕學者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學術研究水準也越來越高。要真正地瞭解這一學術界的最新動向，沒有比和國內同行、同事多接觸更好的方法了。所以自己但凡能夠抽出一點時間，即便得忍受飛行十數小時的痛苦，仍是欣然飛往中國參加這樣或那樣的學術會議。每一次參加會議自然都要提交論文。幾年下來，集腋成裘，不知不覺地以中文撰寫的文章就多了許多。

以上的原因比較實在，其他外國學者一定會有同感。但除了這一原因之外，作為一個以“漢學”為自己研究中心的美國學者，我的“國際化”不是自近日始，我早就界定了自己的學術圈子應該以中國為中心。我的老朋友李零教授說，我曾對我的西方同行說過，我是“以中國人為聽眾”的。我記不清楚自己在何時、何種場合講過這句話，但說過與未說似乎並無多大關係，因為我的的確確是這麼想，這麼做的。我以為，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工作者，誰能檢驗我們的理論、結論是否正確？誠然，我們的聽眾包括我們的學生、研究生，偶爾也會包括社會大眾，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同一學科內的同行學者。我們所作的研究如果不通過這些同行的檢驗審核，就很難說站得住站不住腳。於是接踵而來的問題是，我們的同行學者究竟是誰？多數的外國漢學家以為，他們的同行學者是與他們來自同一國家或地域，有着相同或相似學術背景的學者。我覺得有這種看法是相當自然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但他們所治的漢學只是西方漢學或是日本漢學，和中國漢學未必是同一個學科。（當然，中國國內的漢學也只是國內的漢學，然而這個圈子畢竟比其他漢學都大多了。）這就是雖然他們和中國學者討論的問題相同，但是研究方法和結論往往大相逕庭的原因之所在。對此李零教授曾不無感慨地說外國漢學家和中國漢學家之間的交流頗“好像聾子式的對話”。李教授的這個比喻非常生動形象。然而，使我感到困擾的是，我常常覺得與自己有溝通問題的不是中國學者，而

更多的是西方漢學家。我深信我們漢學界的母語就是中文。所以只要是用中文寫的，不但中國漢學家應該會評價，並且西方漢學家和來自東亞其他國家的漢學家也都能看得懂。文章無需大聲疾呼。有文便能共賞，因此即便是聾人之間也可以交流、對話了。

目 錄

興與象

- 簡論占卜和詩歌的關係及其對《詩經》和《周易》的
形成之影響..... 1

《周易》“元亨利貞”新解

- 兼論周代習貞習慣與《周易》卦爻辭的形成 20
- 試論鄉字在何組卜辭裏一種特殊用法 47
- 再論周原卜辭由字與周代卜筮性質諸問題 57

重寫儒家經典

- 談談在中國古代寫本文化中抄寫的詮釋作用..... 86
- 從出土文字資料看《周易》的編纂..... 105
- 簡論“閱讀習慣”

- 以上博《周易·萊卦》為例..... 120
- 試論上博《周易》的卦序..... 134
- 阜陽漢簡《周易》簡冊形制及書寫格式之蠡測..... 146
- 再說《繫辭》乾專直，坤翕闢 159

先秦時代“書”之傳授

- 以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為例..... 163

釋濠

——兼論《毛詩》的訓詁方法一則·····	179
由銅器銘文重新閱讀《詩·大雅·下武》·····	187
試論西周銅器銘文的寫作過程	
——以眉縣單氏家族銅器為例·····	193
由眉縣單氏家族銅器再論膳夫克銅器的年代	
——附帶再論晉侯蘇編鐘的年代·····	206
從親簋看周穆王在位年數及年代問題·····	222
從作冊吳盃再看周穆王在位年數及年代問題·····	226
公元前 1000 年前後東西文明交流三則 ·····	234
三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	239
四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	257
非常道考·····	270
《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結論·····	285
西方漢學的古史研究	
——《劍橋中國古代史》序言·····	293
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 ·····	311
仁之思也清，知之思也偃 ·····	317
何謂“中中學術”？	
——兼論中國何時變成“中國”·····	329

興 與 象

——簡論占卜和詩歌的關係及其對《詩經》和
《周易》的形成之影響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論語·泰伯》

聖人立象以盡意。

《繫辭傳》

神對於詩人們像對於占卜家和預言家一樣，奪去他們的平常理智，用他們作代言人，正因為要使聽衆知道，詩人並非借自己的力量在無知無覺中說出那些珍貴的辭句，而是由神憑附着來向人說話。

《蘇格拉底對伊安的話》

占卜刻辭仍然是現在所知中國最早的文字資料。無論這是否能夠說明中國古代文明比其他地區的文明更重視宗教（不少西方漢學家說兩河流域文明最早的文字資料都與經濟有關係，而中國最早的文字資料，即甲骨文和青銅禮器上的銘文，都和宗教有關係，說明中國更重視宗教^①），我們確實可以說占卜在中國古代文

① 這個說法在西方漢學界比較普遍，可以舉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N. Y. : SUNY Press, 1999, 頁 15) 為相當權威的例子。

明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但表徵宗教的地位，並且對中國文學和哲學也都有着深刻的影響。中國傳統文獻的起源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追尋到占卜的習慣。自從漢代以來，中國傳說一直以爲《周易》是第一經典，而《周易》的起源與占卜有密切關係。20世紀以後，一些文學批評家提出《周易》可以視作從商代甲骨卜辭到《詩經》的媒介，有的甚至論證《周易》和《詩經》在文學形式上非常相似（其實，早在清代初年，顧炎武已經暗示過類似的看法），^①認爲這至少表明兩部書來自同樣的文化環境。這些觀點無疑都很有道理，可是我覺得《周易》和《詩經》的關係不僅僅是在形式上而已。得到上引蘇格拉底對伊安所說之話的啟發，即“神對於詩人們像對於占卜家和預言家一樣，奪去他們的平常理智，用他們作代言人”，我們應該也可以發現《詩》的神學意義。下面我打算從中國古代占卜考察《周易》的原來性質和形式，然後從《周易》的形式問題再轉到《詩經》的形式和性質。從這樣的比較中也許我們對中國最重要的這兩部經典能夠體會到前人所未言之新認識。

討論中國古代占卜，學者們通常從商代甲骨卜辭入手。然而，我覺得傳世文獻更可以說明占卜的文學意義。《史記·孝文本紀》載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說呂太后死後的內戰平定以後，漢朝的劉氏勢力（特別是齊王劉肥和淮南王劉長）請代王劉恒稱帝。劉恒是高祖劉邦的兒子之一，爲人有“德至盛”之譽，然而對承繼皇帝之位他仍然“猶與未定”。於是在這種危機情況之下令卜人占卜，故事如下：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

^① 譬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頁13—14；李鏡池：《周易筮辭考》，載於《古史辨》第三輯（北平：樸社，1931年），頁187—251，有更精彩的論述。西方學者當中當以 Pauline Yu（余寶琳），*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頁37—43。

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①

這個故事雖然沒有提到卜人“卜之龜”的題目（即占卜之“命龜”或“命辭”），但是根據其他占卜記錄，我們可以推測命辭是“我欲爲天子，尚饗”一類的禱告之辭。遇到龜甲上的兆文以後，占人做了繇辭，謂“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這個繇辭像傳世文獻上其他繇辭一樣是由三句話組成的，第一句對兆文作形容，後二句將兆文和占卜的題目聯繫起來。兆文形容爲“大橫庚庚”，“橫”是《史記·龜策列傳》裏頻繁提及的兆文，大概像卜一類的樣子（就是橫畫比這個要長），每次都說是“若橫吉安”，應該是非常吉祥的兆文。“庚庚”很可能是龜甲兆文裂開後所發出的聲音（甲骨文學家多說“卜”不但是象形字，也是擬聲字，古音是 *pok），《史記集解》引張宴解釋說“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史記索隱》謂“‘庚庚’猶更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都以“庚”當作“更”的假借字，意思是“更改”或“更代”。占人對兆文作這樣的形容不一定很客觀（特別是兆發出的聲音應當以何字來寫定恐怕多有主觀成分，這是我們後面還要討論的現象），但是遇到吉祥兆文以後他接着作韻文謂“余爲天王，夏啟以光”，意思是劉恒作皇帝得到龜和鬼神的贊同，又如張宴所說的那樣：

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至啟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

^① 《史記·孝文本紀》（中華書局本），卷10，頁413—414。

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跡，言似夏啟者也。^①

因為這個繇辭提到“王”而不謂“帝”，所以劉恒仍然未被說服，等到卜人說明“天王”就是“天子”，他才同意，以後做了著名的漢文帝。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得到很大啟發。“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這三句話的韻文是這次占卜的“繇辭”，是卜人或者占人得到龜甲上的兆文以後所發明的辭，一邊形容兆文、一邊說明兆文的意義。繇辭的“繇”很重要，與一些同源字都有關係，特別是童謠的“謠”和《周易》術語的“爻”。

在漢文帝劉恒占卜即天子之位將近四百年以前，中國傳世文獻上載有另外一個占卜記錄，與《史記·孝文本紀》所載故事頗相似，也值得深入考察。《左傳·襄公十年》載有鄭皇耳侵略衛國的故事，衛君孫文子想要反攻，但是他也猶豫不定，令卜人占卜。完整的故事如下：

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②

儘管這個占卜記錄也不完整，沒有全載占卜過程的每一細節，可是大體上還是相當清楚。像《史記》的故事一樣，這次占卜也造出了一個“繇”，謂“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像《史記》的繇辭

^① 《史記·孝文本紀》，卷10，頁415《史記集解》所引。

^② 《春秋左傳正義·襄公十年》（《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本）卷31，頁246（總頁1948）。

一樣，這個繇辭也是由三句韻文組成的，第一句明顯的形容龜甲上的兆文“兆如山陵”，到底像一個什麼樣子很難說，但是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像山陵的卜兆可能會像“Λ”或相似的樣子。要說明這個兆文的意義恐怕就更難，但是在中國古代自然界山是比較危險的地帶，山陵應該更是如此。無論如何，也像《史記》的繇辭一樣，《左傳》的這個繇辭的後兩句也將兆文的意義聯繫到占卜的題目，即反攻鄭軍，謂“有夫出征，而喪其雄”。也像劉恒那樣，孫文子也不理解這個繇辭的意思，是說他“出征”反攻鄭軍“而喪其雄”（就是他）還是說鄭軍因為“出”征“而喪其雄”（就是鄭君）？因為孫文子不清楚，所以問了定姜。定姜即“姜氏”，恐怕不是占人，而可能是一位“由神憑附着來向人說話”的女史。她說明了繇的意義，謂“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意思很清楚是說兆文的危險是對鄭軍而言，因此“征者”，亦即鄭，會“喪雄”。反之，據姜氏判斷，繇辭的這兩個句子是衛國之反攻的吉兆，因此她接着說“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姜氏的這兩個句子不屬於原來繇辭中，而是對繇辭的解釋，應該算是占辭。

除了它內在的歷史意義以外，《左傳》的這個占卜記錄對理解《周易》爻辭的性質和形式也特別重要。這是因為姜氏說的“禦寇之利”顯然是《周易》爻辭裏幾次出現的術語“利禦寇”之變形，如《漸》九三爻辭：

《漸》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很清楚地，這個爻辭的前三句話與上引《史記》和《左傳》的“繇”有同樣的形式。

大橫庚庚（陽部）：余爲天王（陽部），夏啟以光（陽部）。

兆如山陵（蒸部）：有夫出征（耕部），而喪其雄（蒸部）。